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

傅宗文

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清廷相继设立闽（福州、厦门）、粤（广州）、浙（宁波）、江（镇江云台山）四海关。从此，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正式被置于海关的管辖之下。海关长官称监督，其出任途径不同，闽海关由将军兼，江、浙海关由巡抚兼，粤海关在总共一百七十多任监督中，由督抚兼职者不过五十六人，其余则概归内务府“包衣”（皇室“家人”），由皇帝简点，任职期间“不必听督抚节制”，可作为“皇帝的直接代表”行事^①。身份卑下，来路特殊，权柄显赫，是早期海关人事中一个相当注目的现象。因之就形成了这样的权力结构模式：垂直驾驭，州郡兼理，可以概括之为纵主横辅的十字框架。

中国历史悠久，朝代繁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一代人的行事，在现实物质利益和营构意念驱动外，还不能不借鉴历史这面镜子。

海外贸易管理模式的变动，当然不能不追寻历史的展痕，以揭示问题的深刻诱因。

一

中国东临太平洋，海洋线曲折绵长，造船与航海技术，远古时代已兴起并渐趋发达，海上交通相随出现。但算得上是海外贸易行为的最早纪录，见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该书记述今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同中国汉朝的关系说：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缗而往。^②

显然可见，西汉武帝扩疆南抵珠崖郡（今海南省），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交往，

开辟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因此,明代人称作贡舶贸易的朝贡关系便自然开始(所谓“献见”即朝贡)。为海外珍奇所诱惑的汉廷,也便招募“蛮船”(估计当是岭南越人)南下,明代人称作市舶贸易的经济交流亦宣告产生。“有译长,属黄门。”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指出:“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于)中,使关通内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无员,属少府。”可知译长(市舶长)当即黄门侍郎,少府属官。按少府设自秦代,掌山海池泽税收,“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马,不领于天下”(《汉书·食货志》上作“天子”)之经费。”^[3]是名符其实的皇帝封君的私家库藏机构。少府属下又有管“海税”的“海丞”,掌果实的“果丞”^[4],以及采购珠玉金银的专官^[5]。因此,海外珍奇的采购便也由少府黄门管领。当时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皆用姓族”,直至后汉和帝皇后邓绥临朝听政时(106—121)才改命宦竖执事^[6]。这样,汉武帝时期,海外贸易的两个管理机构基本定型:贡舶贸易归大鸿胪(秦设典属国主朝贡,成帝时并入大鸿胪),市舶贸易发自少府。盖因其时海外珍异物品的采购与享用,一时还只是君主贵胄的特殊权利。所以,无论何种贸易,就都不能不在皇帝的直接掌握中。魏晋以降,兵荒马乱生产衰退,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适应性没有变化,而稳定性却得到加强,以致唐朝初年,将隋文帝创设的“缘边交市监”^[7],从隋场帝移入四方馆的隶属关系中分割出来,更转交给少府监^[8]。高宗显庆六年(661)二月十六日敕:

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入。^[9]

显而易见,时迄公元七世纪,唐廷依恃牢固的历史传统,仍将边境交市和有所发展的南方市舶交易,交由少府监管辖和搜罗。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商品经济以及市舶贸易的发育程度极其有限,浩大的宫廷需要铸就了海外贸易必须严格纳入帝室吮吸管道。

但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又不难发现,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袤境域,虽属缓慢,却又以蚕食的方式点点滴滴条条块块地得到垦辟。文明的星火在持续撒播。三国孙吴政权立国东南,加大了垦辟力度。征山越,设郡县;于今福建福州置典船校尉,建造海舶;“篙工楫师,选自闽禺。”^[10]组建闽粤越人船队。于是,黄龙二年(230)派船队搜寻夷洲和洲。赤乌五年(242)派兵征讨珠崖和儋耳。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226—231)间,更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印度支那半岛,“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1]扩大了中国文明向境外宣传的社会效果。这些就都为南朝时期南海国家与地区对华贸易新态势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12]“商舶远届,委输南州。”^[13]“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4]文帝元嘉七年(430),诃罗陀(在今印尼境内)王竖铠派员来华,其表辞竟请求:“市易往返,不为禁闭。”“愿敕广州,时遣舶还。”^[15]——“商使”、“商舶”、“市易”,一串新概念,报导了海外贸易的早春信息。

经过时光酝酿,作为对华贸易新态势的折射反映,是隋场帝于即位后对鸿胪寺的改

组，增设一个下属机构四方馆，辖东、西、南、北四个使者。其功能是：

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16]

四方馆的特色在于首次把贡舶、市舶贸易的经管职能合并，并辟图独立设馆，“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17]对鸿胪寺无非尚仍挂名，实际上置废不常，损益由己。如果说日后的市舶司是中国海关的前驱，则四方馆应就是市舶司的滥觞。只是它的寿命与隋朝相一致，过早夭折。

二

市舶司初创于盛唐。以盛唐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步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正由于这种灿烂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发挥的强大吸引力，又由于中亚大陆“丝绸之路”的遽然阻断，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国家与地区各方增长了交流冲动力汇合在一起，遂将中国大唐帝国与海外的贸易潮流，推成波瀾。

市舶司创立于玄宗开元二年（714）^[18]。其年，为底定宫闱，扫除政敌而屡建奇功的万骑御林军的高级将领、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便首膺是职。周不负年青君主的婉寄，莅职后“广造奇器异巧以进。”^[19]然即招致谏臣的切责。为“昭宣菲薄”，玄宗不得不稍作姿态。开元四年（716），谏臣杨范臣指出：“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20]便是明证。以之对照高宗显庆六年（661）敕文，追寻汉武帝遣少府黄门下南海的历史端倪，对市舶司初设的底蕴，旨在为皇帝进献“御府珍贡”^[21]，当能得到确解。宋人最不明白玄宗的初衷，喋喋不休：“炳炳祖训，舶利最博，庶宽民力，免于椎剥。祖宗之意，盖念民邛。宣和以来，悉归应奉，如唐舶使，以奇器进，治乱之几于此分。”^[22]其因盖在于草创时期的市舶司，适应着低度的贸易额与专制改体，只能是对此前历朝皇室通过鸿胪寺与少府监直接渔夺海外珍宝历史积淀的继承和发展，与日后市舶贸易炽盛时期的市舶司职能颇不相同。

迨天宝初年，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司监官就又转入阉竖掌握。宠臣与宦官几乎霸占了市舶使职位。但，另一方面，唐廷仍适当借重地方，给岭南节度使兼带押蕃舶使^[23]、结好使^[24]等系衔。不过，朝廷派来的市舶使或宦官“监舶使”^[25]，“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26]直到德宗贞元前期，王虔休以郡王馆改建为市舶使院，才正式有了市舶使馆署，十字框架的结合更趋于完善。

开天以后，市舶贸易总体上是日见兴旺。“异域殊乡，往来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27]“溟涨之外，巨商万舰，通犀南金，充牣狎至。”^[28]市舶贸易显已超轶贡舶茅苴。

海外舶商航抵广州后,唐廷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28]可在被指定街衢“列肆而市”^[30]。凸显了在封建经济体制夹缝中也有一小股商品市场经济的涓涓细流。而其消长涨落,正是日后市舶司管理体制变动的制约因素。

唐朝崩溃后,横亘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过渡时期。在戎马倥偬岁月里,东南诸割据政权,依然建立名异实同的市舶司机构,诸如吴越的“博易务”^[31],闽的“榷货务”^[32],漳泉的“榷利院”^[33]等等,持续发展沿海一线各自的海上贸易。只是由于文献缺略,不得详闻。

宋元二代,海外贸易繁荣昌盛,市舶司的数量和体制有了较大变化。

北宋建国后,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重心所驻的江南广大区域商品经济尤为突出。城镇草市星罗棋布。河汉海岸港口繁多。风帆所向,自太平洋西北海岸逶迤西南,穿越印度洋直抵非洲东海岸,寄港口多达一百余处。宋代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元代兴废不常,最多时也有7个。南宋高宗绍兴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高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五分之一。元仁宗年间市舶司年入也高达数十万锭。从北宋后期崛起为海上丝瓷香药之路东方最大港口的泉州刺桐港,蜚声中外,记录该港市舶贸易的专著,宋末有赵汝适《诸蕃志》,元末有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舶法规,也相继在宋元二代问世,前有《广州市舶条》(又称《元丰市舶法》1080年),后有《市舶则法》(1293年)。

宋代贡舶贸易仍有所发展。约略统计,入贡的国家或地区约有26个,先后入贡300多次。中央主管机构,北宋前期实行名实乖异、事权分化的职官建制,历史上的传统做法大幅度改变,鸿胪寺、四方馆等机构实同虚设,入贡使团按区位“分隶于往来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34]。如礼宾院“掌蕃夷朝贡、互市,以阖门祗候已上及三班、内侍二人监”^[35]。宋初定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为三班,太宗雍熙四年(987)组建三班院,内侍即宦官,均系御前人员,常由皇帝简任出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掌管或过问各有关政府职能事务,不仅如此,宋代皇帝对朝贡一事常常亲自把持,包括接待礼仪、食宿安排、回赐物品、引伴途程等等^[36]。对于贡品,或优估回赐,或抑价收购。进贡人员的“私觐”(私市)物品,则转交市舶司处理。

宋承唐制,初期市舶司实行“州郡兼领”:

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37]

太祖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即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并充市舶使,通判谢处丑兼市舶判官。之后杭、明州市舶司援例命使,但“每岁止三班、内侍专掌,转运使亦总领其事”^[38]。显然,“州郡兼领”乃虚衔,御前人员“专领”、“专掌”则实权所在。这个做法大致延续到神宗即位前。神宗即位后,以理财为急务的变法逐步展开,凡常平、坑冶、茶马与市舶各置提举并设相应独立的衙门,“俱号监司”^[39]。市舶司自此从州郡脱颖而出。因此宋人又曾以为严格意义上的市舶司,便在此时:“熙宁初,创立市舶一司。”^[40]迨元丰

改制，市舶提举明令由转运使兼掌。“州郡兼领”局面结束。转运使是宋朝管理路一级财政并对地方吏治实行监督的中央要员，其兼掌市舶司，标志朝廷直接掌握市舶贸易的垂直驾驭的权力结构只在形式上作出调整，动作的实质未变。徽宗即位，为粉饰“丰亨豫大”局面，朝廷开支急速上升，罗掘费用财源成为燃眉之急。崇宁初年便将浙、闽、粤三路市舶司提举官改为中央派遣的专官出任。其收入“宣和以来，悉归应奉（局）”^{〔41〕}，成为赵佶、蔡京集团糜烂生活的物质基础。至此，市舶司垂直系统再次加强，一线到底，完成北宋一代的第三次改革。

因应前述局面，北宋京师汴京分设二座当年国内最大的香药库，补助国用的称外香药库与真宗天禧五年（1021）设立的归皇室私用，“貯细包香药，以备内中须索”^{〔42〕}的内库。后者库房多达28间。此外，存贮海外舶货的尚有内藏库与奉宸库，均由皇帝支配，规模庞大，如奉宸库曾奉旨一次提取“象牙、真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交易”^{〔43〕}，金宝满仓情形由此可以想像。从而可知宋代皇帝对市舶贸易确实做到专其权而收其利。

南宋建立于遍地狼烟中，境土半蹙，财政竭蹶，鼓励并切实发展海外贸易自为当务之急。所以，从其诞生之日起，便继续对外开放政策，恢复并添设长江下游三角洲一批市舶司（先后共8个），依然奉行由中枢派遣市舶提举官，并实行把市舶收入转交户部的新制度。对市舶提举官的遴选，高宗皇帝颇为郑重，例如：

（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四日，右中奉大夫直显谟阁知抚州李庄，除提举福建市舶。上曰：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之任。^{〔44〕}

其用意可能有二：品评其人之资质；面授其人以机宜。但无论如何，皇帝召见一个正欲履新的市舶长官，仍具有勉励与告诫不可低估的双重意义；同时，这又是皇帝驾驭市舶贸易的表征。

南宋初年，地方政权大多重新组建，新朝廷一时也难遥控地方衙门之间的争斗。因此，炎兴年中市舶司的分合与改隶显得颇为频繁。而中期以后，北宋“州郡兼领”的现象则又有几分回泛，如泉州市舶提举官自宁宗嘉定后皆以知州兼权，即为显例。

宋亡元兴，来自漠北草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较中原为低的蒙古贵族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力。海外的珠光宝气使他们为之目眩，垂涎三尺。所以，攻占福建泉州刺桐港之后，翌年即率先在这个世界大港口重设市舶司，重用阿剌大海商蒲寿庚，任命其长子蒲师文兼福建路市舶提举并以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职衔，与副使孙胜夫、尤永贤等“通道外国，抚宣诸夷”^{〔45〕}。泉州市舶司则以福建都督忙古剌兼领。之后又设上海、宁波、澈浦三个市舶司，以福建安抚使、澈浦海商世家杨发为监督。正是由于元朝政府的纵容鼓励，市舶贸易迅速出现高潮。“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等过番兴贩。”^{〔46〕}沸沸扬扬，“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47〕}世祖二十六年（1289），行泉府司所统市舶海船多达15000艘。然而基于蒙古、色目人文化素质低下，对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所知甚少，因之未能在多处市舶司设立之后，进行有效的管理，忽兴忽废，四开四禁，直

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以后,才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市舶司的隶属关系亦处于经常变动状态。自然,外部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的动荡,与乎自身内部机制之间的纠葛摩擦,不能不给元朝的市舶贸易带来损伤。

三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明代元谢,标志着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周秦以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明太祖尚未即帝位,便于“吴元年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48〕}。即位后又置市舶提举司于太仓黄渡镇,旋罢,又置于宁波、泉州、广州。似乎可以迎来一个市舶司复兴的黄金年代。但由于自元朝后期即从东北亚洲朝鲜半岛浸淫南扰中国沿海的倭乱蔓延扩大,明太祖断然也采取了隔离外患的禁海措施;同时,为甄别域外国家与地区通商诚意与否,树立宗藩秩序,明廷制订出严格的朝贡制度,又把历史久远、素称发达的市舶贸易错误地颠倒为贡舶贸易附庸。明人坦承:“我朝贾海有禁,其所司者朝贡一事而已。”^{〔49〕}这就不能不阻碍市舶贸易发展商品经济的前途,摧残了唐宋元各代曾经生气蓬勃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

按明廷规定,朝贡必须依所定贡期、贡道、贡舶、贡规等一整套烦琐制度行事。如泉州市舶司专理琉球贡事,宪宗成化十年(1474)移往福州,一旦贡舶抵岸,即派兵封船,引入馆驿,仍由兵将“守把柔远驿门,(市舶)提举司给示,禁止夷人不许擅自出入交通,贸易违禁货物”^{〔50〕}。自京城贡毕回福州,则刻日“将夷人逐一搜检上船,防送至(长乐县)梅花千户所地方开洋回国去讫,取具沿途经过各该巡司地方,各不致纵容登岸,收买违禁货物并夹带人口等项结状缴报各衙门”^{〔51〕}。且勿论明廷如何将贡奉人员视同敌人,即以不许他们与中国百姓交易接触而言,朝贡纯粹只是一种政治装饰品。当然,明太祖为表示“皇恩浩荡”泽及四海,允许将数量有限的“附至蕃货”,按规定在严格范围之内“官给价钞收买”^{〔52〕},或在京师设定区域(会同馆)内,在礼部官员监督下与商民交易。其情状委实苍白可怜。但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扩大严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53〕}既已“禁海”,而又“禁陆”,至此完全斩断了市舶贸易的历史传统,来了一个历史大倒退。

迨成祖即位后,鉴于其时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虽重申“禁海”,但对若干“祖制”渐予松弛。同时又开放“库市”,许“贫民承令博买”^{〔54〕},“许令贸易”^{〔55〕},“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56〕}这种极有限的“开放”措施,总算是海外贸易锁国坚冰开始丝丝融化了。

明代市舶提举司大致与宋元相似,设正副提举及吏目若干,隶于所在布政司。而自成祖永乐元年(1403)始,命宦官齐喜提督广东市舶,又命宦官杨斌提督泉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北移福州后,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湾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但三衙虽分设,实际统于一。时人云:“主以中贵一人。”^{〔57〕}“总闽蕃舶事。”^{〔58〕}“统其

事。”^{〔59〕}宦官在事实上成为市舶司事务“总”而“统”之的指挥官。其提督市舶司不仅表示御前人员直接掌握贡舶贸易的一个升级,同时又是推戕贡舶贸易于泥潭的一个倒退。如宪宗成化时:

广东市舶太监韦眷招集无赖驱儉数十百人,分布郡邑,专鱼盐之利;又私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缙、宝玉、犀象、珍玩之积,郿坞不如也。然犹奋其威诈,渔猎民财无厌,衔冤者莫敢诉,持禄者莫敢问,官府所鞭撻者,困圉所系者,皆种禾捞规之民。^{〔60〕}

这仅仅是明代税 罄竹难书的恶行之一斑,其严重程度已令人毛发悚然。

显然,市舶司机构背离了市舶贸易的历史轨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桎梏。而随着当时社会生产的进步(尤以东南地区为突出),商品经济日逐浪高。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亦依稀地在手工业、商业乃至农业生产部门里破土萌芽。从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中,这一新生事物渐为世人刮目相看。东南沿海,福建土瘠民贫,历来恃海为生。宋元二代,以泉州刺桐港为枢纽,福建的市舶贸易获得长足发展。明初禁海之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于是“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61〕}。岁月渐深,小舸巨舶,云帆争发,海上走私不可遏止。其势荡荡,与炽烈的倭乱一时间构成沿海萃萃大端。明朝政府无法镇住这股市舶洪流,穆宗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呈“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62〕}。经明廷上下长时间争议,隆庆六年(1572)批准实行“引税制”,一船一引,按引分等征税,并于主要发舶港口月港所在地海澄县改海防馆为督饷馆,由海防同知及漳州府佐分署税务、饷务官。当地时人《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确切指出:

市舶(司)之设,是主贡夷及夷商来市者,与今漳(州)税(饷)不同。^{〔63〕}

饷税开征后,增长极为迅速。隆庆末年额原定3000两,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跃为29000两,递增967%,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近50个。时人周起元曾加以评论:

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剝舡艘,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64〕}

即此可见,顺应历史发展,既不同于宋代纲船,又有别于元代官本船的月港商舶,在私人商家出资,船主指挥下,开辟了海外贸易的崭新局面,而其管理机构——督饷馆,也与明代市舶司迥然不同,带有向“自由”贸易时期海关转化的新特点。

〔1〕 邓开颂:《清政府对广东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载白寿彝主编《清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81—482页。

〔2〕《汉书》卷28下《地理志》。

- [3] 《史记》卷30《平准书》。
- [4] 《汉书》卷12《平帝纪》。
- [5] 《汉书》卷72《贡禹传》。
- [6] 《后汉书》卷43《朱穆传》，同书卷10《皇后纪》。
- [7] [16] [17] 《隋书》卷28《百官志》。
- [8] 《唐六典》卷22《互市监》。
- [9] 《唐会要》卷66《少府监》。
- [10] 《全晋文》卷74，左思《吴都赋》。
- [11] [14] 《梁书》卷48《诸夷》，时间据《三国志》卷60《吴书·吕岱传》。
- [12] 《宋书》卷97《传论》。
- [13] 《南齐书》卷58《扶南传》。
- [15] 《宋书》卷97，本传。
- [18] 详拙作：《中国古代海关探源》一文，《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19] 《唐会要》卷62《谏诤》。
- [20]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
- [21] [26] [30] 《全唐文》卷515，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 [22] 许月卿：《百官箴·提举市舶箴》。
- [23] 《全唐文》卷580，柳宗元：《岭南节度使军堂记》。
- [24] 上书卷611，裴次元：《奏广州结好使事由奉诏书谢恩表》。
- [25] 上书卷764，萧邺：《韦正贯神道碑》。
- [27] 上书卷355，萧昕：《张九皋神道碑》。
- [28] 上书卷505，权德舆：《徐申墓志铭》。
- [29] 上书卷75，唐文宗：《太和八年疾逾德音》。
- [31] 周昂：《十国春秋拾遗》。
- [32] 《十国春秋》卷99《张睦传》。
- [33] 福建泉州开元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南唐保大四年）。
- [34] 《宋会要·职官》二五之一。
- [35] 上书二五之六。
- [36] 上书三五之一六至二一。
- [37] [38]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
- [39] 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
- [40]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七。
- [41] 许月卿：《百官箴·提举市舶箴》。
- [42] 《宋会要·食货》五二之六。
- [43] 上书三八之三二。
- [44]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五。
- [45] 汪大渊：《岛夷志略》卷首吴鉴序。
- [46] 《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则法》。

- [47] 吴澄：《吴文正集》卷32，《董文炳神道碑》。
- [48] 《明太祖实录》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条。
- [49]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林趾：《福建市舶提举司记》。
- [50] [51] 上书《宾贡》。
- [52] [55] 《明会典》卷111，《礼部》69《外夷》上。
- [53] 《明太祖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条。
- [54]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按语。
- [56]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6，《市集考》。
- [57]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林趾：《福建市舶提举司记》。
- [58] 上书同卷，林瀚：《尚公桥记》。
- [59] 上书同卷，杭济：《提督福建市舶题名记》。
- [60] 黄瑜：《双槐岁钞》卷9《奖贤文》。
- [61] [63]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 [63] 上书卷8《税珣考》。
- [64] 张燮：《东西洋考·序》。

作者傅宗文：1934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